**那个时代书生的姿势**

有些姿势，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其实，坐、卧、起、立、跪，乃至作揖、鞠躬、握手，所有的动作，都是心灵的姿势，都需要一根骨头支撑。没有了骨头，卧床的身体，也只是一具皮囊。

**下跪**

　　 在人前下跪，我一直以为是奴才的姿式，是软骨的病状。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以庄严的法律形式正式废除延续了千年的跪拜礼，和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国家宣示，都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刘节，也是一个灵魂永不下跪的人。男儿膝下的黄金，在这个读书人心中早已种下了拒绝曲膝的种子。但是，1927年6月清华园中的一幕，重新塑造了他的膝盖。

　　 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的投湖自尽，犹如在平静的颐和园里投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刘节随同导师陈寅恪等人赶到那个悲伤的地方。除了那份简短从容的遗书之外，再也没有找到一代大儒告别人世的任何因果。

　　 刘节在王国维的遗容中看到了拒绝生还的决绝表情，遗书中那些平静的文字从此就一直刻进了他的脑海：“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刘节参加了王国维遗体的入殓仪式。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宓、陈达、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北京大学马衡、燕京大学容庚等名教授西服齐整，神情庄重，他们头颅低垂，弯下腰身，用三次沉重的鞠躬，向静安先生作最后的告别。

　　 陈寅恪教授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师生，都看见了他那身一丝不苟的长衫，玄色庄重，布鞋绵软。陈寅恪步履沉重地来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的下摆，双膝跪地，将头颅重重地磕在砖地上。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瞬间惊呆了，校长、教授、朋友、学生，在陈寅恪头颅叩地的三响声中，突然清醒过来，一齐列队站在陈教授身后，跪下，磕头，重重地磕头。

　　 刘节，就是此刻在教授们身后跪倒的一个学生。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突然间明白了，在向他的导师，一代大儒王国维先生告别的时候，下跪，磕头，才是最好的方式，才是最庄重的礼节。这样的仪式，才能和先生的马褂以及头上那根遗世的发辫融为一体。望着陈寅恪教授远去的背影，刘节想，陈先生用了一种骨头触地的姿势，完成了对王国维先生的永别。陈寅恪教授，不仅仅是王国维先生遗世书籍处理的最好委托之人，更是对死者文化精神和死因的理解之人。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上的文字，此刻穿透时光提前到达了刘节身边。两年之后才出现在陈寅恪教授笔下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突然在陈寅恪教授下跪的瞬间落地。刘节成了这段碑文的催生之人。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经过时间的打磨，两年之后，屹立在清华园中，在以刘节为首的学生们的请求下，陈寅恪教授提起了那支沉重的羊毫，用金石般的文字，破译了王国维的殉世之谜，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主张彰显了学术人格的本质精髓。

　　 陈寅恪教授的一个肢体动作，无意中改变了刘节对“下跪”这个词的认识和理解，并从此以后影响他的终生。陈寅恪教授，把对王国维的纪念，刻在了坚硬的石头上，刘节先生，则把那段文字刻进了柔软的心里。

**跪拜**

　　 许多年之后，当刘节教授在岭南大学的校园里见到陈寅恪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跪拜”这两个汉字组合的仪式就这样突然来临了。

　　 在国民党败退逃往台湾的混乱中，陈寅恪拒绝了蒋介石的重金诱惑，在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礼聘中来到了温暖潮湿的广州。而他的学生刘节，则早他三年到达广东，在并无约定的时光中等候同老师的再度相逢。

　　 在美丽的康乐园里，学生们知道历史系主任刘节和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似乎没有人了解他们过去的师生关系。但是，每逢传统节日，学生们都可以看到令他们惊诧的一幕。

　　 节日来到陈寅恪教授家里的系主任，彻底脱去了平日西装革履的装束，一袭干净整洁的长衫，布鞋皂袜，一派民国风度。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刹那，刘节教授便亲切地喊一声先生，撩起长衫，跨前一步，跪拜行礼。

　　 在刘节教授庄重的磕头礼中，学生们终于知道了刘节主任和陈寅恪教授的师生因缘，也知道了这对师生1927年6月在王国维先生遗体入殓仪式上通过庄重的下跪产生的心灵交集。

　　 学生们从刘节主任的磕头下跪中完成了对旧时代的认识。当握手成为一个时代礼节的惟一标志，在鞠躬的身影都只能在教科书中寻找的现实中，大学生们开始了对长袍、马褂、布鞋的重新打量，他们的目光看到了陈寅恪教授1927年下跪磕头的情景。

　　 刘节教授用跪拜的仪式展示尊敬和感恩的时候，岭南大学的长衫被时代的世风脱下了，康乐园里换上了中山大学的新装。在课堂上，刘节教授将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文移到了黑板上。刘节教授眨眼之间，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就像时光从沙漏中间穿过，然后又聚集在他的掌上。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刘节教授说，骨头虽然坚硬，但一定得用皮肉包裹。深刻的思想精髓，必定在文字的深处。下跪，磕头，站立，鞠躬，已经不再常见，但当它出现的时候，一定比握手高贵。

**二郎腿**

　　 二郎腿，是人腿在自由状态下的一种姿势，这种姿势的本质是为了让人体舒服。然而，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二郎腿却派生出了多种意义，甚至，在特定的场合下，面对不同对象，还暗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心态。这个时候，腿的姿势成了一种无声的语言和生动的表情。

　　 二郎腿第一次通过我的肢体展示的时候，我还是个无知的少年。父母严厉地喝斥了我，他们让我明白了，在长辈和客人面前架着二郎腿，是失礼和缺乏教养的表现。从那以后，当我需要用二郎腿松弛神经舒展身体的时候，绝对是我独处的场合。当我坐在松软的沙发上捧书入读的时候，一个人的世界里，绝对不会给他人带来轻视、睥睨和冒犯。此时的二郎腿，真正回到了本质意义出发的地方。

　　 其实，二郎腿也并非同尊敬、平等、友好等美好的词汇绝缘。当你同一个身份、地位、财富相当，心灵相通的朋友一起会心交谈开心大笑的时候，身体的任何姿势都不会冒犯朋友的尊严，更不会成为心灵的障碍。

　　 当一个地位显赫，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人接见别人的时候，二郎腿往往成为了这种不平等场合的主角。一条腿用不平等条约强制另一条腿，用一只骄傲的脚尖作内心自负的旗帜。在我半百的人生经历中，多次见到过这种仗势欺人的表演。当别人成为受辱的主角时，我往往闭口，内心却张扬起抵抗的旗帜。当受辱者变成自己时，我则用不屑的神情和敷衍的态度还击，然后迅速撤离战场。

　　 用二郎腿张扬狂妄、自大的人必须先安抚好自己的屁股，当屁股有了安全的支撑之后，才能让轻薄的脚尖摇头摆脑呈现得意之色。这种人往往不是皇帝，他们在地位、官职、财富不如自己的人面前风光无限，而在另一些人面前却头颅低垂，腰肢无骨，如同贾桂复活，从《法门寺》的唱腔里穿越而来，低低地叫一声，奴才站惯了。

　　 曾经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的冯雪峰，有一次在家里接待一个高官。由于级别相当，话题投机，聊天中冯雪峰不知不觉跷起了二郎腿，对方也不在意，一直满脸笑容。客人告别之时两人紧紧握手，冯雪峰一直将他送到门口。当高官的专用小汽车缓缓开来，停在身边时，客人依然站立不动，并不去拉开车门。这个人人都能伸手完成的开门动作，轻而易举，然而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结局。司机打开驾驶室的车门，从车头前面绕过来，躬下腰，替官员拉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护着他坐进车中，然后轻轻关上车门，再经过车头，回到驾驶座位上。

　　 这个动作瞬间点燃了冯雪峰胸中的怒火，他没有想到，有的人，一旦晋升了职务，当了高官，就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下雨让人打伞，出入让人开关车门。出行前呼后拥，有人拿公文包，有人捧保温杯。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车，冯雪峰狠狠地摔了自家的大门，大声骂道：架子大过了皇帝，却是一副小人嘴脸，从此决不让他再进家门！

　　 冯雪峰大发雷霆的时候，古老的中国，万岁的皇帝早已绝迹了。但是，看着那个远去了的高官，他突然想到的却是固定在龙椅上的那个名词。一种推翻了的制度，化作幽灵，附在了后人的身上。

**站立**

　　 一个站立的人，他双腿承受的诚实、忠信的重量如山一般，后人往往需要从一本书的远方开始认识。

　　 我对蒋天枢教授的了解，就是从《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本书起步。这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薄书，让我知道了蒋教授的陈门弟子身份。

　　 蒋天枢从遥远的上海来到广州的时候，他的老师陈寅恪已经双目失明，病重卧床了。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生与老师的第三次见面。在上海开往广州的列车上，蒋天枢想到了许多，他惟一没有想到的是，风云变幻，人生苦短，广州一见，他同恩师竟成永别。

　　 这一年，蒋天枢教授61岁，而他的老师陈寅恪，则已是74岁高龄了。蒋教授不远千里来到陌生的广州探视病中的老师，而陈寅恪先生呢，则要将一个山一般沉重的嘱托交付给最信任的学生。

　　 陈寅恪先生的夫人唐筼女士带着女儿陈小彭在广州火车站迎接蒋天枢，安顿了住宿。接下来的十二天里，蒋天枢将同陈寅恪共叙师生情谊，重温清华园中岁月，郑重地接受一份比泰山还重的嘱托。

　　 那天上午，蒋天枢如约来到了陈宅，唐筼不在家，只有病中的老师孤独地躺在床上。无人招呼，蒋天枢就站在床边，谦恭地听着老师说话。陈寅恪失明多年，早已看不见学生额头上的风霜，更不知道， 61岁的弟子，毕恭毕敬，站立床头。几个小时过去了，唐筼回来，才目睹了这让人心动的一幕。蒋天枢教授，在这个寂静的上午，将双腿的功能通过直立的形式，升华到了极致。

　　 我在陆键东先生《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读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想到了“程门立雪”这个古老的典故。

　　 杨时和游酢去拜见老师程颐，在门外站立等待，睡中的老师醒来时，门外纷飞的大雪已是一尺多深。这个出自宋史的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年，是因为它承托了士人的气节与精神。

　　 1964年5月陈寅恪病床前的蒋天枢教授，无异于另一个时代的杨时。在蒋天枢心中，只有“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的朴素。五十年之后，我隔着遥远的时光，仍能感受得到蒋天枢彼时双腿的酸胀和腰肢的疼痛。我离开书桌，站立起来，五十年前蒋天枢先生的仁义忠恕和辛苦，立刻传到了我的身上。

　　 真正的尊师敬长，无须千言万语，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即双腿直立的一个人体姿势：站立。

　　 广州一别，蒋天枢教授停止了自己的著述，他用心血和所有生命余下来的时间来全力完成老师的郑重嘱托。

1981年，三百多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出版，这套皇皇巨著，总结了一个刚直不阿的史学大师一生的学术成就，让一个杰出学人的终生心血化作文字留传于后世。但是，却少有人知道蒋天枢为这套巨著出版付出的十多年时光和殷殷心血。至此，已经离开人世十二年的陈寅恪先生，可以瞑目安息了。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是蒋天枢教授校订编辑《陈寅恪文集》的一个附录。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浸透了蒋天枢的心血，蒋天枢先生的半生心血，当得起“牺牲”和“崇高”两个形容词。

　　 陆键东先生说：“在漫长的十年时间里，蒋天枢为恩师献出了许多许多!他曾先后到过钱谦益与柳如是当年主要的活动地点苏州吴江、嘉兴等地查访，为陈寅恪找到了不少有关‘钱柳因缘’的材料。蒋天枢于陈寅恪晚年的意义，不仅是他给了陈寅恪一份浓浓的师生之情，而且他还使陈寅恪在坚守‘独立之精神’的士人气节上，无限欣慰地感到‘吾道不孤’!”

　　 一个目光炯炯的盲人，在一个站立的上午，面向他最信任的学生，完成了文字托孤的庄严仪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了解蒋天枢先生付出的出版机构。出版社汇出3000元人民币，作为他十多年艰辛劳动的报酬，但是，蒋先生却拒收了这笔钱。蒋天枢发自肺腑地表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

　　 在蒋天枢先生的内心，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他已经把老师的嘱托放置到了神圣的高台，所以，他的一切劳动和付出，都是责任，与金钱物质无关。然而，对待自己的学生，他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的后记中，蒋天枢的学生章培恒有一段关于老师的追忆：

　　 大概是一九五八年，先生有一次忽然对我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我点《诗义会通》，你跟我一起点吧!”我当然遵从。但先生只要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了一部《诗义会通》；二是在先生点完后我从头到底读了一遍。过了几个月，先生把我找去，交给我一张出版社所开的叁佰贰拾元的支票，并告诉我：“《诗义会通》的稿费来了。你取出来后，自己先到书店去买部书，我已经代你到书店去看过，局刻本《二十四史》和缩印本《四部丛刊》都不错，价钱也合适，你随自己喜欢买一部。多下来的钱给我好了。”我到书店一看，《二十四史》是一百八十元，《四部丛书》缩印本是二百五十元。于是我懂得了，先生知道我穷，无力买这样的大书；如果买了送我，又怕我心里不安，所以用了合作点书的名义，让我不致太为难。其实，先生自己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因为不愿曲学阿世，五六十年代只发表了两篇考证文章和校点了这部《诗义会通》，稿费收入之少可以想见；但《诗义会通》的稿费的大部分却都给我买书用去了。

　　 章培恒先生的这段话，让后人看到了精神的传承路径和源头指向。徐百柯先生的《民国风度》一书，有一段关于章培恒教授的描述：“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议要背蒋先生，全然不知自己也已年过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章培恒教授，本来可以在读书人的人体姿势中，添上一个“背负”的动作，可是他的老师拒绝了。一种不朽的肢体语言，永远存储在了章教授心中，至今未能发芽。

**安坐**

　　 安坐是屁股的仪式，由于腿的功能退居幕后，屁股的表情便更加隐蔽。客观来说，人的屁股在严密的纺织品包裹之中，不露声色，所以，屁股的真实嘴脸，有时便曲折婉转地借助语言和手、脚来表现。

　　 其实，有史以来，屁股始终是不平等的。龙椅上，只供有皇帝的屁股，别人是不能染指的。当皇帝安坐在威严的龙椅上的时候，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只能肃立或者下跪。

　　 在一张1958年的旧照片上，我看到了两张普通的木椅，木椅上面安坐的是两个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蒋介石和胡适，以并肩而坐的姿势，穿越辽阔的海峡和五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出现在一个写作者的眼前。

　　 蒋介石的神情气度保持了他一贯的严肃和威仪，符合一个领袖的身份，他正襟危坐，服饰严整，身姿端正。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胡适却二郎腿高跷，神情轻松，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照片是真实的，但仅仅是瞬间的记录。胡适的二郎腿和领袖的正襟危坐构成了巨大的疑问，它让我一直思考，在威严如日中天，人人见而敬畏的蒋介石面前，胡适用高傲的二郎腿，难道是为了展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我在那幅照片的深处，终于寻觅到了胡适和他那条著名的二郎腿的真相。就在同蒋介石合影之前，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暨第三届院士会议上，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交锋。胡适对会上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发表的讲话极其不满，他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终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以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论述违反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原则，干涉了学术研究的自由。

　　 胡适的答谢词以石破天惊的愤怒开头。“总统，你错了！”胡适的当头棒喝让毫无防备的领袖眼冒金花。在蒋介石的极度错愕中，胡适又毫不客气地说：“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蒋介石愤怒的引信瞬间点燃了，他勃然变色，拂袖站立，若不是张群、陈诚等人拉住，他肯定会踢翻座椅，扬长而去。

　　 照片上的蒋介石，不露声色。照片背后的蒋介石却一腔怒火，屈辱让他长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我相信，蒋介石在同胡适的会后合影中，他愤怒的潮汐依然没有消退，惊涛裂岸的声音依然让随从们胆颤心惊。

**二郎腿**

　　 傅斯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又一个敢于同领袖平起平坐，并且在领袖面前高跷二郎腿的又一个读书人。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这个“五•四”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1919年5月4日的上午，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一直冲进赵家楼。徐百柯先生说：“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

　　 傅斯年拒绝从政，一生精力投入学术和教育。这个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忠心耿耿的读书人，对贪污腐败恨入骨髓。抗战时期，他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搜集行政院长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证据材料。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劝其不要惹火烧身。

　　 为了保护孔祥熙，平息傅斯年的怒火，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专门置设筵席，宴请傅斯年。

　　 宾主落座之后，傅斯年虽然跷起了二郎腿，但却没有半点不恭敬的意思。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却让蒋介石颜面难堪，一众陪客大惊失色。

　　 蒋介石问：“孟真先生信任我吗？”

　　 “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毫不犹豫。

　　 此刻的蒋介石，满脸轻松，笑容亲切：“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瞬间就明白了蒋委员长设宴的目的，也明确无误地断定，领袖话中的“我所用的人”的所指。他突然血往上涌，斩钉截铁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孔祥熙之后的另一任行政院长宋子文，更是施展权力，利用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各种手段积聚巨额财富。傅斯年愤怒已极，连续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战斗力极强的檄文，在《世纪评论》和《观察》发表。傅斯年一针见血地直指腐败根源：“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中华民国历史上两任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因为傅斯年揭发弹劾而下台。而孔祥熙和宋子文，一个是蒋介石的连襟，一个则是蒋介石的妻舅。所以，他的老师，敢于在蒋介石面前架着二郎腿的胡适，也为他担心，劝他小心行事。

　　 新闻照片，不仅是现场的真实记录，也是人物心灵的自然流露。傅斯年的二郎腿，不仅在领袖面前骄傲地展示，在作为国宾的洋人面前，他也没有刻意地掩饰和收敛。

　　 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那一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蒋介石率领“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这位美国的五星上将。在第二天报纸刊登的新闻照片中，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在贵宾室就座，“五院院长”等政要们垂手恭候，“三军司令”立正挺身。傅斯年坐在松软的沙发上，口衔烟斗，跷着二郎腿，吞云吐雾，潇洒自若。新闻报道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这个让人惊叹的场景，引出了别人的评价，那是《后汉书》中范晔评价郭林宗的语言的借用：“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徐百柯先生说：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傅斯年猝死在台湾大学校长的位子上。临死前的那个晚上，他深夜写稿，他对催他休息的夫人俞大綵说，他赶写文章是为了早点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身上的单裤，已不足御寒了。他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了，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第二天，在“农复会”会议上，傅斯年为台大教育问题答辩，在讲台上站立而死！

　　 有的时候，二郎腿，就是血性的一种姿势。